

接送古丽和巴郎子

□ 蒋敏然（上海，高级教师）



古丽和巴郎子是维吾尔语，用于称呼女孩和男孩。2000年9月开始，国家在北京、上海等12个经济发达城市的一类高中开办了“内高班”。我所在的学校是上海市教委直属高中之一，从2002年9月起接受新疆内高班学生，班级里各民族的学生都有。

也算与这些孩子有缘，我短暂地教过他们几年，也有幸被学校新疆部指派，接送孩子们来沪和回疆。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里，让我见识了一批批热情豪迈、坚毅知礼的古丽和巴郎子们。

早在2006年8月，受学校委托，我到乌鲁木齐迎接内高班学生回沪。到达雪莲宾馆，早已西出阳关的我拨通了我任教的一届班长阿依古丽的电话。那一头，古丽清亮的、略带口音的普通话悠悠地传来：“老师，您快来呀！我家就在解放路。您坐51

路车，我到车站接您。”爽爽的、不带停顿的汉语，立时鼓起我去家访的念头。

阿依古丽长着一张类似北欧人的脸：白皙的皮肤、蓝色的大眼睛、高而笔挺的鼻梁、胭脂般红色的嘴唇以及黄赭色的头发。她的家两室一厅，不算大。一家四口，有个哥哥当时在大连读大学。进门换鞋，只见地上铺着维族特色的羊毛地毯，一尘不染。好客的父母看到上海的老师来了，立时把瓜果，刚买来的各种样式、各种口味的馕，大盘鸡，拉条子都放到了桌上，酷似过节了。我不吃辣，而拉条子是用切成片的羊肉，加上皮芽子（洋葱）、西红柿、辣子等翻炒而成，又香又辣又美艳。好客而豪迈的维吾尔家长给我上了一大盆。只尝了一口，辣得我张口吐舌泪眼婆娑！她的父亲立刻要求妻子帮我重新炒一个放

很少辣子的拉条子。

真是既享受又惭愧的家访啊！今年7月送新疆学生回家，虽然火车上好多不同地区的学生希望我能去他们家做客。可一想起十年前的经历，我还是决定不打扰他们了。

内高班学生来回都是乘坐国家统一调拨的火车，有严密的安全措施。但火车上的硬座位子和40小时左右的行程还是十分考验暑期来回一次的孩子们的。两个晚上的时间他们有时也请求列车员让同学们在有空位的硬卧上挤一挤；老师们每隔2小时也会问问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是每当我们要求他们到我们的硬卧上去睡一会儿时，永远是孩子们坚决的摆手和摇头！大美新疆！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风景之美，更可贵的是内高班学生的言行之美！我爱新疆广阔的原野，更爱来自新疆的古丽和巴郎子。

母亲和她的地

□ 方长英（安徽黄山，铁路客运值班员）



半个多月没有见到母亲，心中有些挂念。吃过了晚饭，电话打去了妹妹家，妹妹说妈妈睡了。“才过八点，怎么睡得这么早？”哎！妹妹长叹了一口气。“妈妈这些天，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地，去了也是去看着，那一片地被推了，妈妈可惜坏了。”

心中放心不下，第二天坐早班车去看母亲，到妹妹家也就六点刚过，母亲已经去了菜地。还没走过马路，就看见薄雾中母亲弯腰在捡着什么。母亲看见我愣了一下，似乎没回过神来。手上扯着一节青青的南瓜藤。顺着母亲的视线望去，推土机的印痕清晰可见，新鲜黝黑的泥土翻滚在沟壑的两旁。连根翻起的庄稼，有的已经粉身碎骨，有的已经枯萎干瘪，有的已经被泥土埋住了半截，有的歪着倒着依然绿意盎然。

这是很大的一片圈地，缓缓绵延上下

两面山坡，围墙顺着山势而建。母亲说她也是跟着其他人一起来开的这片地，刚来时荆棘遍布杂草丛生，母亲在这片土地上花费的心血只有她自己知道。贫瘠的土壤已经被母亲粪得黝黑发亮，母亲在这片土地上已耕耘播种了五个年头。自从我妹妹的女儿上了幼儿园，母亲就在这个原本陌生的县城，寻找到了另一种寄托。母亲是农民，最拿手的就是种地。母亲喜欢站在坡上坎下，手搭凉棚望着风中的庄稼摇曳生姿，就像看着自己茁壮成长的孩子一样心生欣慰。在城市，母亲常常迷路，常常站在十字街头茫然不知所措，只有走近土地，才走进了生活的中心，才有了用武之地。就是这几年母亲把她种的菜，从绩溪带去屯溪给她的大女儿，连同在绩溪县城的姑妈、表哥、表姐都去母亲种的地里摘菜。母亲去年冬瓜就摘了二三十条，最大

的三十八斤。绩溪有一道名小吃：冬瓜饺，又叫水馅包。姑妈、表哥、表姐每家做冬瓜饺就去母亲地里扛一条冬瓜来。

母亲把那一片有五六个屋基大的地侍弄得简直像花园，东边的一畦是芝麻，芝麻的旁边是红薯，中间的一畦是辣椒，后面的两长条是玉米。母亲走进玉米地，掰下一个顶着青嫩胡须的玉米棒，撕开外面的玉米衣，玉米粒如婴儿牙齿般错落有致，咬一口甜香爽口。母亲说，再养个十几天就好了，可惜是可惜，总比埋在土里好。母亲边说边掰下半箩筐的玉米棒，说是拿回去煮给外孙、外孙女吃。最后母亲好像和谁赌气一样把碗口粗的冬瓜，皮球大的南瓜，拇指般弯钩似吊着的丝瓜，全采了下来，装了满满一箩筐。

我和母亲抬着那个箩筐回妹妹家，我们走几步就歇一歇，我感受到的是重量。